

# 早期隔代抚养对初中生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曾迪洋 洪岩壁

**〔摘要〕** 隔代抚养是我国早期养育中的常见模式,但其效果众说纷纭。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考察儿童学前是否隔代抚养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儿童初中阶段的教育(学业成绩、认知能力分数)和健康(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超过 1/4 的儿童在学前主要由祖辈进行隔代抚养。其次,城镇地区的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采取隔代抚养,但在农村不显著。第三,简单 OLS 回归和定序 logit 回归表明早期隔代抚养对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但对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存在一定消极效应。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进行的稳健性检验支持这一简单回归结论。第四,早期隔代抚养对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存在异质化效应,对家长教育水平较低的弱势家庭孩子有显著积极效应。

**〔关键词〕** 隔代抚养;学业成绩;认知能力;心理健康;自评健康

近年来,多个学科的研究都发现早期抚育对儿童未来发展和成年后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至关重要(Todd & Wolpin, 2003; 洪岩壁、刘精明, 2019)。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投资能显著提升其成年后的教育获得和收入水平,降低犯罪可能性(Heckman, Pinto & Savelyev, 2013)。孩子越小,其可塑性越强,早期投资的累积效应也就越大,远大于后期干预(Cunha & Heckman, 2007)。所以在孩童的早期抚育过程中,抚育方式对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Del Boca, Martino & Piazzalunga, 2017)。因此,学术界日益强调学前看护和学前教育的融合与一体化,认为其对教育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岳经纶、范昕, 2018)。但另一方面,随着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提高,父母亲自抚育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女性就业与抚育孩子之间的冲突日渐凸显(Waldfoegel, 2007; 熊瑞祥、李辉文, 2016)。在国家放开二胎生育的政策背景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育龄夫妇不打算生育二胎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儿童照顾方面的压力太大(钟晓慧、郭巍青, 2017)。隔代抚养也因此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然而很多家长对此又充满担忧和焦虑。2017 年底至 2018 年初,网络上一篇题为《“隔代抚养”正慢慢毁掉孩子的一生》的佚名文章在多家网站转载,点击量颇高,便反映了这方面的忧虑。可见,探讨父母和其他照料者对幼儿抚育的影响和效果显得尤为必要。

---

曾迪洋,社会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京 210023);洪岩壁,社会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南京 211189)。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健康状况对阶层固化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17CSH063)、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7SHC002)和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的支持。

然而已有研究对父母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抚育的关注颇为不足,尤其对隔代抚养的研究还较少(Fergusson, Maughan & Golding, 2008)。相较于西方,中国的隔代抚养更为普遍。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地区,(外)祖父母在儿童抚育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Goh, 2009)。国家卫计委家庭司(2016,第151页)于2014年进行的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显示,有26.9%的农村孩子日常生活主要由祖辈照管;而城镇孩子的这一比例为9.7%。研究表明真正决定儿童发展结果的并非家庭收入,而是家庭教养实践(Heckman & Mosso, 2014)。因此,由谁来养育孩子、采取什么教养方式就变得极其重要。以往有关中国隔代抚养的研究鲜有研究考察隔代抚养对儿童的中长期影响,如其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成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尝试回答三个问题:哪些家庭在学前采取隔代抚养?学前阶段的隔代抚养会对孩子初中阶段的教育和健康发展有什么影响?早期隔代抚养的影响在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中是否存在异质性?

## 一、隔代抚养现状及其效应

### (一) 隔代抚养现状

隔代抚养包含两大类,第一类是父母缺失、完全由祖辈抚养的隔代家庭。这类家庭在我国比例较低,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隔代家庭在市、镇、县的比例分别是1.56%、1.76%、2.41%,2010年的隔代家庭相应比例分别是1.26%、2.44%和3.89%(王跃生,2013)。第二类指在三代家庭中,祖辈提供隔代抚养或看护,这也是已有研究中主要讨论的隔代抚养类型。根据空间安排和时间分配两个维度上不同程度的代际合作,这一类隔代抚养包含了多种形式(钟晓慧、郭巍青,2017)。空间安排上较为普遍的是共居型和近距离的分居。时间分配上,一种是全日制,父母上班前双方交接,下班后由父母接手;另一种是半天或周末的兼职制。由于隔代抚养尚未有一个公认的精确定义,因此不同调查研究对我国隔代抚养的比例估测也存在分歧。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1991—2004年间数据显示,中国有45%的祖辈与0—6岁的孙辈居住在一起,祖辈每周看护抚育孩子的时间基本与母亲相当(Chen, Liu & Mair, 2011)。在农村和城镇,0—5岁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和家庭日常教育者首先是母亲,其次便是祖辈(国家卫计委家庭司,2015)。就15岁以下少儿的夜间照料而言,一半多的儿童由母亲照顾,由祖辈照顾的儿童超过20%,其中绝大多数是祖父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第149页)。郭筱琳(2014)估计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儿童接受隔代抚养,而在北京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虽然具体比例存在分歧,但基本结论无疑是隔代抚养在我国幼儿抚育中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祖辈在孙辈抚育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是受传统父权文化的影响,这和西方非常不同(Xie & Xia, 2011)。但近年来研究显示,西方国家的祖辈在孙辈抚育方面的角色也在日益强化。在美国,祖辈在提供经济支持和儿童看护上的作用变得日渐重要(Swartz, 2009)。在欧洲,58%的(外)祖母和49%的(外)祖父在过去的一年都向15岁以下的孙辈提供了某种形式的看护,其中28%的祖辈几乎每周或更频繁地看护孙辈(Hank & Buber, 2009)。英国有44%的儿童经常由祖辈照看(Fergusson, Maughan & Golding, 2008)。这一趋势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社会的单亲家庭比例持续增加(Swartz, 2009)。如帕特南(2017,第150页)认为美国的全职隔代抚养模式主要集中在下层社会,因为下层阶级家庭濒临解体;但在上层阶级的家庭内,隔代抚养并不常见,也未呈现增长之势,因为上层社会中鲜见支离破碎的家庭。可见社会经济形势和结构的变化比传统文化更具有解释力。

女性就业率增长和幼托相关社会保障的缺失是影响隔代抚养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未成年子女,父亲在日常照顾方面普遍缺席(王向贤,2019)。因此,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无法全职育儿,从而增加了对隔代抚养的需求;而祖辈能提供抚育和看护也会增加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

(Compton & Pollak, 2014)。在农村,照管儿童的需求也会阻碍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而替代性的公共看护服务则有助于缓解这一阻碍作用(熊瑞祥、李辉文,2016)。然而,即使存在其他儿童看护服务,但母亲往往认为祖辈提供的抚育和看护是最好的,至少优于付费的看护服务(Goh, 2009; Chen, Liu & Mair, 2011)。计生委的调查显示,在需要每周工作的农村女性中,隔代抚养比例更高,但这在城市不显著;父母无法亲自照料的情况下,收入较低的家庭往往倾向于隔代抚养,但这一关系仅在农村地区显著(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 2016, 第 154—156 页)。有调查显示,53.3%的一孩家庭不打算生育二孩,其中70%的家庭将“无人照料幼儿”列为不愿生育的首要原因(钟晓慧、郭巍青, 2017)。“父母能否帮助带孩子”成为影响年轻夫妇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政府目前几乎没有针对0—3岁幼儿的公共幼托服务(彭希哲、胡湛, 2015)。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儿童照顾政策存在“隐性家庭化”取向,弱化单位制基础上的政府照顾责任,使儿童照顾的主要责任重回家庭,导致母亲和祖父母成为学龄前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岳经纶、范昕, 2018)。由此可见,我国的隔代抚养现象不仅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余波,同时也深受当下社会经济结构因素的影响。

## (二) 隔代抚养的效应

隔代抚养对儿童存在何种影响? 积极还是消极效应居多? 已有研究对此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多数学者都认为隔代抚养的效果不如父母亲自抚育。父母双方和子女共同居住的核心家庭被认为是对孩子的发展最为有利的家庭结构或居住安排形式(吴愈晓等, 2018)。与父母相比,祖辈往往更少关注和回应儿童的心理情感需求,倾向于将儿童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视为无礼(郭筱琳, 2014)。一项对12个月的幼儿在一年后的追踪调查表明,隔代抚养儿童在身体生理发育上与父母抚养组无显著差异,但在神经心理行为发展上显著落后于父母抚养组(张月芳等, 2015)。隔代抚养的幼儿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情绪问题、行为障碍、性格缺陷、人际交往缺陷和适应性较差等问题,其中男孩的行为问题多于女孩(王玲凤, 2007)。也有研究发现接受隔代养育的青少年与父母养育组在综合心理健康上无差异,但父母养育组的社交能力优于隔代养育组(石志道、曹日芳, 2010)。研究者认为产生消极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祖辈在隔代教养中往往“重养而轻育”。很多老人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儿童身体健康上,而忽视了儿童心理、人格及社会性等方面的开发与培养(张月芳等, 2015)。计生委的调查报告也指出,我国现阶段隔代抚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养育重于教育。在农村地区,孩子日常生活主要由祖辈照管的比例为26.9%,而日常教育由祖辈承担的比例为20.5%;城镇地区,孩子日常生活由祖辈照管的比例为9.7%,日常教育由祖辈承担的比例为4.7%(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 2016, 第151页)。换言之,隔代抚养中祖辈多负责看护和生理生活方面的照管。

另一方面,隔代抚养也存在积极效应。在我国农村,与祖辈同住能降低儿童的辍学概率,但这一效应受到同住祖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Zeng & Xie, 2014)。台湾的研究也发现,与祖辈同住孩子的学业成绩要高于家中无祖辈同住的孩子(Kuan & Yang, 2004; Pong & Chen, 2010)。英国的研究表明,相比于看护机构的孩子,祖辈看护的幼儿在命名词汇(naming)方面更具优势,但在基本概念发展和非语言推理方面处于劣势(Del Boca, Martino & Piazzalunga, 2017);祖辈看护与孩子词汇测试分数正相关,但与问题行为分数负相关(Hansen & Hawkes, 2009)。由此可见,隔代抚养的利弊究竟如何,学界仍存在不少争议。Waldfoegel (2007)指出,非父母抚育的效应会随孩子年龄增长而变化,母亲就业对3岁前幼儿的认知和行为发展负效应最大,而对上学后儿童的影响较小。因此有必要把隔代抚养的效果放到儿童成长发展的生命历程之中来考察。

国内已有研究多关注隔代抚养的即时影响,而鲜见对隔代抚养的中长期效应进行评估。即使隔代教养存在短期消极效应,但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可能会有所提高和改善(王玲凤,

2007),因此抚育方式和儿童认知发展之间短期内可能存在相关,中长期来看这一相关可能会消失(Del Boca, Martino & Piazzalunga, 2017)。其次,以往研究没有很好地控制相关的家庭特征。很多隔代抚养的负效应可能是使用这一抚养方式的其他家庭特征导致的(Fergusson, Maughan & Golding, 2008)。隔代抚养本身是一项家庭决策,影响这一决策的因素也可能同时影响孩子的发展。因此,本研究利用一项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考察儿童学前是否隔代抚养对其初中阶段学业成绩、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的影响,我们尽可能控制了相关的混淆变量,并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来控制未观测变量的影响,以期获得早期隔代抚养的真实效应。

## 二、研究设计:数据、变量与模型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基线数据。该调查以7年级和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根据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使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作为调查点,并在入选的县级单位中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中的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学生样本量为19487人。剔除部分不适用样本和缺失值个案后,进入本研究分析样本的个案数是14318。CEPS数据的优点在于控制了同期群效应,即消除了由于不同世代经历不同事件导致的效应。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学前是否隔代抚养,通过询问家长“孩子上小学以前,主要由谁来带?”进行操作化。我们剔除了学前主要由非父母和(外)祖父母亲属、非亲属和保姆带的样本<sup>①</sup>。隔代抚养包括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为主要抚养人的情况(0 = 父母抚养,1 = 隔代抚养)。

为了考察早期隔代抚养的影响,我们关注7年级和9年级学生的教育和健康状况。具体而言,因变量包含考试成绩、认知能力、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这四个变量。因变量的操作化如下:(1)考试成绩是学生在2013年秋季学期的语文、数学和外语期中考试标准化分数的均值。(2)认知能力是学生的认知测试分数,测量了学生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但不涉及学校课程所教授的具体识记性知识,具有全国标准化和可比性。为便于理解,我们把标准化的认知测试分数转化为0—100分。(3)心理健康变量询问学生在过去七天是否有以下感觉:沮丧、抑郁、不快乐、生活没有意思、悲伤。取值为1—5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健康状况越好。(4)自评健康变量询问学生“你现在的整体健康情况如何?”答案为从“很不好”到“很好”的五分选项,由于选择“很不好”“不太好”的个案很少,因此把这两个选项的个案合并到“一般”类别中,形成“一般”“比较好”“很好”三分类的定序测量。自评健康是被访者对自己总体健康状况的评价,对个体生理健康状况的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齐亚强,2014)。

根据以往研究,我们把父母特征和家庭各类资本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父母特征包括父母教育程度和父亲职业阶层。(1)父母教育程度取父母双方中较高者,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2)父亲职业阶层分为管理人员/公务员、专业人员、工人、自雇、农民和无业/失业六类。(3)家庭经济资本包括家庭早期经济条件和当前经济条件,取值1—5分别代表非常困难、比较困难、中等、比较富裕和很富裕。(4)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自对下述家庭教育参与变量的因子分析:教育期望、学习和生活监管、亲子互动频率、家庭藏书量、孩子与父母一起读书和参观文化设施(吴愈晓等,2018)。因子分析得到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5)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孩子的年级(1 = 九年级,0 = 七年级)、性别(1 = 男性,0 = 女性)、年龄、族群(1 = 汉族,

<sup>①</sup>由父母和(外)祖父母以外人员抚育的儿童占总样本的2.62%。分析样本中由祖父母抚养的儿童占18.21%,外祖父母抚养的儿童占7.74%。

0 = 少数民族)、移民(1 = 是,0 = 否)、户籍(1 = 非农,0 = 农业)、是否独生子女(1 = 是,0 = 否)、是否上过幼儿园(1 = 是,0 = 否)、是否小学前生过大病(1 = 是,0 = 否)。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参见表 1。

本文的模型建构主要分三个步骤。首先,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是否采取学前隔代抚养的因素。在模型中仅纳入与儿童早期状况相关的家庭变量,即排除了父亲当前职业、当前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因为这些变量可能发生在学前隔代抚养决策之后。其次,分析隔代抚养对学生初中阶段因变量的影响。根据因变量的特性,我们对自评健康进行定序 logit 模型分析,对考试成绩、认知测试分数和心理健康变量采用简单 OLS 回归。第三,为了尽量控制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获得两个互相匹配的父母抚育和隔代抚养样本,对匹配后样本进行回归,考察隔代抚养的效应。第四,为了考察隔代抚养效应的异质性,利用交互项分析隔代抚养与家长教育水平之间的交互效应。

表 1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全体样本	父母抚育	隔代抚养	Pr( diff≠0)
学业成绩	70.73(8.30)	70.67(8.36)	70.91(8.11)	.140
认知能力分数	43.99(17.82)	43.78(17.84)	44.60(17.74)	.015
心理健康	3.926(.801)	3.944(.790)	3.874(.830)	.000
自评健康：一般	26.69%	26.05%	28.54%	.001
较好	35.33%	35.12%	35.92%	
很好	37.98%	38.83%	35.54%	
9 年级	48.50%	48.38%	48.84%	.626
男生	48.92%	49.42%	47.50%	.044
年龄	14.52(1.24)	14.52(1.23)	14.51(1.25)	.495
汉族	92.28%	92.29%	92.27%	.979
外地户籍	16.73%	17.02%	15.89%	.110
非农户籍	45.68%	44.82%	48.14%	.001
独生子女	44.26%	42.68%	48.76%	.000
上过学前班	80.48%	80.35%	80.86%	.501
早期经济条件	2.718(.642)	2.716(.646)	2.725(.629)	.478
当前经济条件	2.814(.589)	2.812(.589)	2.818(.589)	.569
上学前生病	8.77%	8.24%	10.29%	.000
父母教育： 小学及以下	8.50%	8.78%	7.70%	.000
初中	44.01%	45.00%	41.20%	
高中	28.68%	28.73%	28.54%	
大学及以上	18.81%	17.49%	22.56%	
父亲职业阶层： 管理人员/公务员	12.98%	12.25%	15.05%	.000
专业技术人员	5.87%	5.88%	5.82%	
工人	33.15%	30.73%	40.04%	
自雇/个体户	18.28%	19.12%	15.89%	
农民	26.04%	28.28%	19.66%	
无业	3.69%	3.73%	3.55%	
家庭文化资本	.020(.588)	.030(.588)	-.008(.586)	.001
家庭社会资本	.025(.536)	.037(.535)	-.011(.536)	.000
N	14318	10604	3714	

注：表中数据为均值或百分比,括号中为标准差。Pr( diff≠0)提供了父母抚育和隔代抚养样本间差异的双尾 t 检验或卡方检验的 P 值。

三、分析结果

如表 1 所示,样本中读小学以前主要采取隔代抚养的学生占 25.94%。这一比例高于前述卫计委家庭司的调查数据,但远低于一些学者所说的 50%。表 1 第五列的简单比较结果显示,隔代抚养

组和父母抚育组在学业成绩上无显著差别,但在认知能力、心理健康、自评健康上都存在显著差异。隔代抚养组在认知能力上略高于父母抚育组,但在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上都低于后者。在个体与家庭特征方面,我们看到男生由父母抚育的比例略高,独生子女由祖辈抚养的比例显著更高,学前生过大病的学生由祖辈抚养的比例显著更高;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由祖辈抚养的比例显著更高;管理人员和工人子女进行隔代抚养的比例更高,而自雇/个体户和农民子女由父母抚养的比例更高;父母抚育组的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显著高于隔代抚养家庭。父母抚育组和隔代抚养组在儿童是否上过幼儿园、早期家庭经济条件和当前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户籍儿童早期采用隔代抚养的比例虽略高于外地户籍儿童,但差异不显著;而非农户籍儿童早期采取隔代抚养比例显著高于农业户籍儿童。<sup>①</sup>由此可见,虽然农村地区由于留守儿童问题存在较高比例的隔代抚养,但城市地区的早期隔代抚养现象亦不容忽视。

（一）谁被隔代抚养？

为进一步厘清影响隔代抚养的因素,我们构建了影响学前是否隔代抚养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 1 是全样本回归结果,模型 2 是城镇非农户籍学生样本回归结果,模型 3 是农业户籍学生样本回归结果。

表 2 早期隔代抚养影响因素的二分 Logit 回归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城镇)	模型 3(农村)
父母教育：			
小学及以下(参照类)	—	—	—
初中	.052(.076)	.402(.180) *	-.024(.084)
高中	.121(.081)	.476(.181) **	.030(.095)
大学及以上	.345(.090) ***	.687(.183) ***	.228(.154)
9 年级	-.023(.070)	-.058(.111)	.085(.091)
男生	-.097(.039) *	.001(.056)	-.183(.054) **
年龄	-.002(.029)	.021(.048)	.026(.037)
汉族	-.028(.074)	.114(.112)	-.167(.100) #
外地户籍	-.037(.052)	-.078(.082)	-.002(.069)
非农户籍	-.034(.046)	—	—
独生子女	.197(.044) ***	.261(.067) ***	.138(.061) *
上过学前班	-.018(.050)	-.019(.083)	-.021(.063)
早期经济条件	-.039(.031)	-.110(.054) *	-.002(.039)
上学前生病	.298(.066) ***	.351(.109) **	.279(.083) **
常数项	-1.00(.443) **	-1.73(.729) **	-.578(.565) **
- LL	8148.57	3800.96	4336.37
Pseudo R <sup>2</sup>	0.58%	0.93%	0.38%
N	14318	6541	7777

注:表中的系数为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p<0.1,\*p<0.05,\*\*p<0.01,\*\*\*p<0.001。

我们以父母教育程度和早期家庭经济条件两个变量作为儿童早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模型 1 结果显示父母教育程度对是否采取隔代抚养有显著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可能采取隔代抚养。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往往双方都要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护和养育孩子,从而倾向于让祖辈来抚养。分城乡样本回归说明这一影响主要来自城镇样本。在城镇地区,相比于小学及以下水平的父母,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水平的父母都更可能采取隔代抚养,而且系数随教育程度升高而增大。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程度的父母采取隔代抚养的发生比分别是小学及以

①这与前述卫计委家庭司的调查认为隔代抚养在农村比例远大于城市的结果存在差异,可能是源于隔代抚养界定上的不同。

下教育程度父母的 1.50 倍、1.61 倍和 1.99 倍。<sup>①</sup>但在农村样本中,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在城镇地区,教育水平越高的父母更可能全职工作,从而无暇照料幼儿。早期经济条件仅在城镇样本中显著,经济条件越好,越不可能选择隔代抚养。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对隔代抚养的影响仅在城镇样本中显著。在农村样本中,女生更可能被隔代抚养,农村男生被隔代抚养的发生比是女生的 83.27%,这可能反映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农村更为普遍。总体而言,社会经济因素对城镇隔代抚养决策更为重要;而在农村,文化因素仍具有一定影响力。

## (二) 隔代抚养的效应

为考察早期隔代抚养的利弊,我们运用简单 OLS 和定序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隔代抚养对孩子初中阶段教育和健康变量的影响。表 3 结果显示,当我们控制了一系列早期和当前家庭环境变量后,隔代抚养对孩子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都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上,隔代抚养都呈现出显著负效应。隔代抚养学生比父母抚育学生在心理健康分数上低 0.04 分,略小于户籍和是否上过学前班的效应幅度。在自评健康上,前者自认为更健康的发生比只有后者的 91.58%。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中指出的“重养轻育”问题存在出入,因为早期隔代抚养对孩子的“育”(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分数)并无显著影响,反而对“养”方面的自评和心理健康却存在显著负效应。已有研究认为隔代抚养的祖辈往往注重儿童的生理健康,而相对忽视心理健康,本文则进一步发现隔代抚养可能对生理健康也存在一定消极影响。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祖辈在健康知识方面有所欠缺相关。以往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也呈现类似结果,父母异地非农就业可能会增加儿童热量摄入,但却显著降低其蛋白质摄入量(徐志刚等,2017)。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隔代抚养虽然对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有显著负效应,但效应幅度并不是很大。<sup>②</sup>对学生成绩、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影响较大的变量主要来自于性别、年龄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父母教育和家庭资本变量,在此不做赘述。

## (三) 稳健性检验:倾向值匹配

简单回归结果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即未观测到变量很可能既影响了家庭的隔代抚养决策,也影响孩子未来的结果变量。因此,我们接下来采用倾向值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在难以找到很强外生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倾向值匹配是一个便利选择,可用于控制样本的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因果性(胡安宁,2012)。因此我们先进行倾向值匹配,然后对匹配后样本再进行回归分析,考察早期隔代抚养的效应。

倾向值匹配过程采用贪婪匹配中最近距离匹配,卡尺标准选取倾向值 logit 标准差的 1/4。匹配后样本量为 7426(干预样本和对照样本各 3713),比分析样本减少一半左右。我们也采用了三种其他匹配方法:以 1/10 的 logit 标准差为卡尺的最近匹配、包括倾向值的马氏距离匹配、不包括倾向值的马氏距离匹配(郭申阳、弗雷泽,2012),核心变量结果无明显变化,系数方向和显著性都与表 4 结果一致。因此,这里仅报告 1/4 卡尺的最近距离匹配结果。对匹配样本的回归分析显示,早期隔代抚养对初中生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具有显著负效应。这一结果与表 3 的简单回归结果一致。表 4 中隔代抚养对心理健康的效应幅度与简单回归几乎相同,而对自评健康的负效应则比简单回归增加了 1/4。因此,表 3 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即早期隔代抚养对学生初中阶段的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但对其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存在显著负效应。

<sup>①</sup>这里报告的倍数和百分比都是通过计算自然常数 e 为底,logit 模型系数为指数的结果,即  $\text{Exp}(b)$ 。

<sup>②</sup>相比于表 1 中心理健康的均值和标准差而言,0.044 的效应幅度并不大。

表 3 早期隔代抚养影响初中生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4:OLS 学业成绩	模型 5:OLS 认知能力	模型 6:OLS 心理健康	模型 7:定序 logit 自评健康
隔代抚养	.143(.152)	.197(.319)	-.044(.015)**	-.088(.036)*
9 年级	1.937(.246)***	6.874(.495)***	-.051(.024)*	-.068(.057)
男生	-3.791(.136)***	.263(.282)	.077(.013)***	.325(.032)***
年龄	-.991(.102)***	-3.242(.204)***	-.032(.010)**	-.043(.024)#
汉族	-1.074(.259)***	.490(.534)	.045(.026)#	.035(.061)
外地户籍	.729(.182)***	-.696(.397)#	-.053(.019)*	.051(.045)
非农户籍	-.520(.169)**	.168(.347)	-.054(.016)**	.046(.039)
独生子女	-.328(.164)*	2.612(.337)***	-.004(.016)	-.068(.037)
上过学前班	.748(.176)***	2.850(.357)***	.050(.017)**	-.009(.042)
早期经济条件	-.472(.147)**	.542(.291)#	.034(.014)*	.063(.035)#
当前经济条件	.298(.166)#	.803(.312)*	.044(.015)**	.177(.038)***
上学前生病	-.227(.249)	-.127(.494)	-.194(.026)***	-.761(.059)***
父母教育: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591(.267)* 1.000(.293)** 2.487(.348)***	1.339(.532)* 2.424(.584)*** 6.327(.714)***	.029(.025) .015(.027) -.033(.034)	.088(.062) -.040(.067) -.066(.081)
父亲职业阶层: 专业人员 工人 自雇/个体户 农民 无业	1.047(.316)** .301(.245) .080(.266) .464(.292) -.498(.427)	.268(.690) .095(.532) .339(.582) -2.587(.611)*** -1.392(.903)	.035(.034) .044(.025)# .043(.027) .086(.029)** .017(.043)	.124(.078) .008(.058) .105(.063)# .003(.068) .154(.100)
家庭文化资本	-.061(.186)	3.322(.386)***	.177(.019)***	.475(.045)***
家庭社会资本	1.006(.180)***	.119(.371)	.112(.018)***	.217(.043)***
常数项/切点	85.80(1.56)***	78.04(3.16)***	4.10(.15)***	-.894(.365)* .701(.365)*
R <sup>2</sup> / - LL	8.55%	13.59%	6.17%	3.53%/15026.3

注:表中的系数为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父母教育和父亲职业的参照类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和管理人员/公务员。N = 14318。#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四) 隔代抚养的异质性结果

上文结果显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采取隔代抚养的可能性存在差异,而早期隔代抚养对初中生的教育结果无显著影响,但对健康存在消极效应。所以我们不必对隔代抚养过度污名化,因为隔代抚养并未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产生消极效应。但导致这一结果的机制仍然晦暗不清,可能存在多个原因。一是隔代抚养绝大多数依然是代际合作育儿,家庭内部形成“严母慈祖”的分工格局,母亲是育儿总管,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祖辈只是承担大量的生理性抚育和照料工作(肖索未,2014)。二是祖辈可能更侧重儿童认知能力发展,从而导致其非认知能力及相关的心理健康较差。三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早期隔代抚养的消极影响会逐渐降低(Waldfoegel,2007),尤其是入学之后家庭更注重孩子的成绩和认知能力发展,从而消除了隔代抚养的负效应。

这部分我们尝试探讨隔代抚养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家庭中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隔代抚养是家庭抚育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同家庭的隔代抚养实践也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使我们更好理解不同家庭如何组织各种资源,把隔代抚养整合进孩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以家长教育作为家庭社经地位的代理变量,通过是否隔代抚养与家长教育的交互项来考察隔代抚养的异质性。如表 5 所示,

表 4 早期隔代抚养影响初中生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回归模型(倾向值匹配样本)

变量	模型 8:OLS 学业成绩	模型 9:OLS 认知能力	模型 10:OLS 心理健康	模型 11:定序 logit 自评健康
隔代抚养	.124(.183)	-.114(.388)	-.047(.018)*	-.110(.044)*
9 年级	1.860(.334)***	6.844(.688)***	-.020(.033)	.058(.079)
男生	-3.690(.187)***	.081(.393)	.072(.019)***	.336(.044)***
年龄	-1.057(.140)***	-3.238(.284)***	-.046(.014)**	-.055(.033)#
汉族	-1.538(.358)**	-.828(.761)	.056(.037)	.042(.089)
外地户籍	.519(.257)*	-.694(.563)	-.008(.027)	.087(.065)
非农户籍	-.717(.237)**	.419(.494)	-.064(.023)**	.083(.055)
独生子女	-.499(.230)*	2.182(.477)***	.015(.022)	-.083(.053)
上过学前班	1.001(.250)***	2.494(.502)***	.057(.024)*	-.001(.059)
早期经济条件	-.401(.214)#	.989(.420)*	.036(.020)#	.093(.050)#
当前经济条件	.549(.230)*	.833(.437)#	.039(.022)#	.132(.053)*
上学前生病	-.276(.316)	-.449(.646)	-.205(.034)***	-.755(.078)***
父母教育:				
初中	.436(.386)	2.375(.777)**	.012(.035)	.049(.091)
高中	.838(.425)*	3.871(.856)***	-.001(.039)	-.062(.098)
大学及以上	2.349(.492)***	7.957(.993)***	-.052(.047)	-.056(.116)
父亲职业阶层:				
专业人员	1.389(.405)**	.705(.921)	-.025(.045)	-.065(.102)
工人	.503(.320)	.000(.702)	-.007(.033)	.003(.078)
自雇/个体户	.219(.359)	.102(.785)	-.004(.038)	.099(.087)
农民	.852(.400)*	-2.009(.838)*	.086(.040)*	-.008(.095)
无业	-.512(.608)	-1.582(1.227)	.005(.060)	.295(.147)
家庭文化资本	.332(.260)	3.112(.556)***	.187(.027)***	.494(.062)***
家庭社会资本	.620(.248)*	.003(.522)	.114(.026)***	.295(.060)***
常数项/切点	86.25(2.16)***	77.45(4.41)***	4.30(.21)***	-1.081(.516)* .516(.516)
R <sup>2</sup> / -LL	8.76%	14.11%	6.57%	3.80%, 7785.47

注:表中的系数为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父母教育和父亲职业的参照类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和管理人员/公务员。N=7426。#p<0.1,\*p<0.05,\*\*p<0.01,\*\*\*p<0.001。

交互项系数在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模型中显著,在两个健康模型中皆不显著<sup>①</sup>。在模型 12 和 13 中,我们发现,对于父母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及以下)的孩子,早期隔代抚养对其初中成绩和认知能力具有显著正效应,但随着父母教育水平提高到初中及以上,这一正效应基本消失。<sup>②</sup>这说明,隔代抚养对社经地位较低家庭的早期教育具有补偿作用,通过提供社会支持有利于孩子未来的学习;但对于社经地位较高的家庭来说,因为隔代抚养导致父母较高的文化资本无法充分传递给子代,从而影响其未来的学业成绩。这也导致了隔代抚养变量在简单模型 8 和 9 中不显著,因为在不同群体中的效应存在稀释和抵消作用。但早期隔代抚养在健康方面皆不存在异质性效应。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CEPS 数据,考察了学前是否采取隔代抚养的影响因素,以及对学生初中阶段教育和健康结果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早期隔代抚养的比例超过 1/4,其影响不容忽视。其次,城镇地区的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在学前采取隔代抚养;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越不可能采取隔代抚养。但

①由于交互项不显著,因此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无交互项的简单模型 10—11,而非模型 14—15。我们也分析了隔代抚养与城乡的交互效应,但皆不显著。

②分教育水平进行的分组回归显示,早期隔代抚养仅在小学及以下组存在显著正效应,在其他组别中系数均不显著。

表 5 早期隔代抚养与家长教育交互项分析结果(倾向值匹配样本)

变量	模型 12:OLS 学业成绩	模型 13:OLS 认知能力	模型 14:OLS 心理健康	模型 15:定序 logit 自评健康
隔代抚养	2.625(.679)***	3.391(1.392)*	-.062(.062)	-.279(.164)#
父母教育:				
初中	1.486(.541)**	4.496(1.094)***	.011(.049)	-.038(.128)
高中	2.439(.571)***	5.664(1.166)***	-.007(.053)	-.136(.134)
大学及以上	3.986(.622)***	9.662(1.283)***	-.076(.060)	-.182(.150)
隔代抚养*初中	-2.070(.739)**	-4.194(1.509)**	.003(.067)	.171(.177)
隔代抚养*高中	-3.169(.756)***	-3.551(1.570)*	.010(.070)	.145(.181)
隔代抚养*大学	-3.239(.768)***	-3.382(1.617)*	.046(.074)	.250(.188)

注:表中的系数为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模型 12-15 分别在模型 8-11 的基础上增加了早期是否隔代抚养与家长教育水平的交互项,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类。在此仅报告隔代抚养与教育的主效应与交互项系数。N=7426。#p<0.1,\*p<0.05,\*\*p<0.01,\*\*\*p<0.001。

在农村父母中不存在这一分化现象。第三,早期隔代抚养对学生初中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但对其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存在负效应。第四,早期隔代抚养对初中成绩和认知能力存在异质化效应,对父母教育水平较低的孩子存在积极效应;但对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孩子无显著影响。

非父母抚育的质量对儿童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发现早期隔代抚养对儿童的健康仍存在长期负效应。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势/劣势区分并非泾渭分明,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由于职业需求,无法提供足够的幼儿照护,只能求助于祖辈;反而是教育程度偏低的父母更可能亲自抚育幼儿。虽然总体而言,中上阶层在子女的教育发展投入上具有优势,但并不表明弱势阶层在各方面都落后于人,他们也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而这可能正是社会能够充分流动的根源所在。同时也应当避免对隔代抚养的过度污名化,因为隔代抚养对弱势家庭孩子的认知能力和成绩都具有积极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对优势家庭孩子的认知能力和成绩也并未产生明显的负效应。隔代抚养短期内仍是我国家庭的一种重要幼儿抚育模式。《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推动儿童早期发展均等化,提高婴幼儿照护的可及性(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2019)。政府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以支持父母抚育幼儿,譬如延长产假的期限、提升 0—3 岁幼儿全职母亲的工作灵活性;或者增加相关公立幼托和早教机构的数量并加强监管提升质量,在凸显祖辈支持的同时尽量降低隔代抚养的不足。

本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早期隔代抚养的具体状况仍不明晰,比如学前有多少时间是在隔代抚养,采取何种形式。其次,由于 CEPS 数据没有收集祖辈的相关信息,因此我们不知道隔代抚养决策与祖辈特征之间的关联。换言之,隔代抚养内部的异质性并未得到展现。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2016:《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6》,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2015:《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郭申阳、弗雷泽,2012:《倾向值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郭志刚、巫锡炜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郭筱琳,2014:《隔代抚养对儿童言语能力、执行功能、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一年追踪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 6 期。
- 洪岩璧、刘精明,2019:《早期健康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胡安宁,2012:《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2019:《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http://www.gov.cn/xinwen/2019-07/15/content\_5409694.htm?utm\_source=UfqNews,2019 年 10 月 7 日获取。

- [美] 罗伯特·帕特南, 2017:《我们的孩子》, 田雷、宋昕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彭希哲、胡湛, 2015:《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第 12 期。
- 齐亚强, 2014:《自评一般健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社会》第 6 期。
- 石志道、曹日芳, 2010:《婴儿期不同养育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国健康教育》第 3 期。
- 王玲凤, 2007:《隔代教养幼儿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儿童心理卫生》第 10 期。
- 王向贤, 2019:《转型时期的父亲责任、权利与研究路径》,《青年研究》第 1 期。
- 王跃生, 2013:《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第 12 期。
- 吴愈晓、王鹏、杜思佳, 2018:《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 肖索未, 2014:《“严母慈祖”: 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熊瑞祥、李辉文, 2016:《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 CFPS 数据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 徐志刚、钟龙汉、周宁、陆五一, 2017:《父母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儿童营养摄入的影响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岳经纶、范昕, 2018:《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 回顾、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第 9 期。
- 张月芳、王伟、朱亚宁、杨丽芳、张欢, 2015:《隔代抚养对婴幼儿体格及神经心理发育的影响》,《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第 10 期。
- 钟晓慧、郭巍青, 2017:《人口政策议题转换: 从养育看生育》,《探索与争鸣》第 7 期。
- Chen, F., G. Liu & C. A. Mair, 2011,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Forces*, vol. 90, pp. 571—94.
- Compton, J. & R. A. Pollak, 2014, “Family proximity, childcare, and women’s labor for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79, pp. 72—90.
- Cunha, F. & J. J. Heckman, 2007, “The technology of skill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pp. 31—47.
- Del Boca, D., E. M. Martino & D. Piazzalunga, 2017, “Investments in early education and child outcomes: The short and long run”, *ifo DICE Report*, vol. 15, pp. 43—48.
- Fergusson, E., B. Maughan & J. Golding, 2008, “Which children receive grandparental care and what effect does it have?”, *Th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vol. 49, pp. 161—69.
- Goh, E. C. L., 2009, “Grandparents as childcare provider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China”,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vol. 23, pp. 60—68.
- Hank, K. & I. Buber, 2009,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e 2004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30, pp. 53—73.
- Hansen, K. & D. Hawkes, 2009, “Early childcare and chil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ol. 38, pp. 211—39.
- Heckman, J. J., R. Pinto & P. Savelyev, 2013,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n influential early childhood program boosted adult outcom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pp. 2052—86.
- Heckman, J. J. & S. Mosso, 2014,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s of Economics*, vol. 6, pp. 689—733.
- Kuan, P. & M. Yang, 2004,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family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two cohorts of adolescents in Taiwan”,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Mobility, and Exclusion*, Neuchâtel, Switzerland: The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RC28),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Pong, S. & V. W. Chen, 2010, “Co-resident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aiw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vol. 41, pp. 111—29.

Swartz, T. T., 2009,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in adulthood: Patterns, variations, and implic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5, pp. 191—212.

Todd, P. E. & K. I. Wolpin, 2003, "On the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cognitive achieve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3, pp. F3—F33.

Waldfoegel, J., 2007, "Meeting children's needs when parents work", *Focus*, vol. 25, pp. 63—66.

Xie, X. & Y. Xia, 2011, "Grandparenting in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vol. 47, pp. 383—396.

Zeng, Z. & Y. Xie, 2014, "The effects of grandparents on children's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Demography*, vol. 51, pp. 599—617.

(责任编辑:程天君)

## The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Grandparenting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al and Health Development

ZENG Diyang, HONG Yanbi

**Abstract:** Grandparenting is a prevalent child-care pattern in China, while its effects on children are still in debate. Using Chinese Education Panel Study (CEPS) baseline dat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amilies' decision on care giver in early childhood, and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grandparenting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gnitive ability) and health outcomes (mental health and self-rated health) in middle schools. Fir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primary school,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 children are primarily cared by grandparents. Second, the parents in urban areas who hav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re more inclined to adopt grandparenting for their children. However, this pattern is not significant in rural areas. Third, simple OLS and ordinal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early childhood grandparenting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gnitive scores in middle school, but play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self-rated health. The propensity scores matching method also support this conclusion from simple regressions. Fourth, there are differential family background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grandparenting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gnitive ability, favoring the children from families with low parental education.

**Key words:** grandparent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cognitive ability; mental health; self-rated health

**About the authors:** ZENG Diyang, PhD in Sociology,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HONG Yanbi, PhD in Sociology,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